

# 自然在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作用

## ——以《瓦尔登湖》与《秋颂》为例

王蕊

大连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1日

### 摘要

文章试图从自然描绘的视角出发, 深度剖析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自然功能, 呈现出共性与差异。通过对亨利·大卫·梭罗的散文经典《瓦尔登湖》与约翰·济慈的传世名作《秋颂》的文本篇细读, 旨在挖掘二者在审美意趣、情感投射及哲学底蕴上与分野的内在联系。研究指出, 英国浪漫主义更多地融入自然视作情感的寄托与诗的阐释, 强调直觉体验与隐隐审美上的自我沉醉; 相比之下, 受超体验主义洗礼的美国浪漫主义则赋予更多的理性思辨、道德感召及社会审视的目的这种基于传统的本土化演变, 不仅诞生了文学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必然, 更体现了思想层面的开拓与革新。

### 关键词

自然, 英国浪漫主义, 美国浪漫主义, 《瓦尔登湖》, 《秋颂》

# The Role of Nature in Anglo-American Romantic Literature

## —Taking *Walden* and *Ode to Autumn* as Examples

Rui W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February 5,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1, 2026

###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eply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nature in Anglo-American Romantic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e depiction, revealing both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Henry David Thoreau's classic essay *Walden* and John Keats's timeless masterpiece

***Ode to Autumn*, the study aims to uncover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ir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emotional projections, and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British Romanticism predominantly integrates nature as an emotional anchor and poetic interpretation, emphasizing intuitive experience and subtle aesthetic self-absorption. In contrast, American Romanticism, shaped by transcendentalism, imbues nature with greater rational speculation, moral appeal, and social critique. This evolution rooted in tradition not only necessitates literary expression within distinct cultural contexts but also embodies intellectual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 Keywords

Nature, British Romanticism, American Romanticism, *Walden*, *Ode to Autum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浪漫主义作为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席卷欧美的重要文艺思潮，不仅是对工业理性与新古典主义美学的反叛，更是一场关于灵魂重构的审美觉醒。在此语境下，自然重塑了古典主义时期的背景板的自然状态，转而化身为充满灵性、能够赋予人类启示的独立主体。英美两地的文学创作虽同宗同源，但在自然的凛然上却各具千秋：以济慈为代表的英国诗人习惯于在自然中寻找心灵的避风港，其笔触充满了内在的风情温情；而以梭罗为首的美国作家则将清教传统与超体验哲学作为浪漫主义的核心观念，使自然成为探索真理、成就自我从而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场地。

近年来，学界对浪漫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既有研究或集中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意象与情感结构如杜维平(2007) [1]，或深入探讨美国超验主义的生态思想与哲学内涵如向玉乔(2006) [2]。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英美浪漫主义自然观的比较研究多停留在“英国重情感、美国重理性”的二元框架中。这一范式虽有其解释力，却遮蔽了二者在本体论层面的深层共鸣。近年来，跨大西洋浪漫主义(Transatlantic Romanticism)研究对此提出了有力修正。如莱斯利·埃克斯指出，济慈与爱默生共享一套关于“想象力作为真理媒介”的认识论前提[3]；詹姆斯·钱德勒则强调，英美浪漫主义应被视为同一“历史母题”在大西洋两岸的不同“编排方式”[4]。这些论述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基于此，本文选取美国超验主义的典范散文《瓦尔登湖》与英国浪漫主义晚期的杰出诗作《秋颂》作为比较样本。两部作品均以自然为核心题材，创作时间均在 19 世纪前中期，且在各自传统中享有崇高地位。本文摒弃了整体比较，转而聚焦于两个具体的微观主题——时间感知与听觉意象，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揭示济慈与梭罗如何在感官与理智、瞬间与循环、审美与伦理的张力中，抵达对自然之“真”的共同追求。

## 2. 跨大西洋的共鸣：自然作为审美与精神共同体的体现

约翰·济慈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之一，其思想对美国超验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时代号召与个人追求的合而为一：当美国的基督教团体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思想框架建立新的神学体系时，以亨利·大卫·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学派以柯尔律治的哲学理念为基础通过不断探索而建立了适用于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思想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5]。尽管侧重点各异，但英美浪漫主义者在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危机时，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自然是具备内在生命力与疗愈功能的精神

共同体在《秋颂》与《瓦尔登湖》中，对自然特色的赞美得到了这种淋漓尽致的体现。

济慈紧承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将感官视为真理的唯一来源，从而建立起感官论观念，以此为据，他再以感官论审视诗歌，认为感官是诗歌创作的唯一媒介，审美是最终目的，从而建立起感官论诗学观念。济慈在《秋颂》中，以其敏锐感官与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构建了一幅饱满、和谐且洋溢着生命喜悦的秋日画卷。诗歌开篇便将秋天拟人化为一位与太阳“密谋”的挚友，共同催生着“藤蔓的硕果、葫芦的鼓胀、榛子的丰盈”。自然在这里不是被观察的客体，而是主动的、充满创造力的合作者。诗中丰富的视觉意象——“缀满苔藓的农舍”、“红透的苹果”、嗅觉意象——“罌粟的香气”与听觉意象——“群蚋的哀歌”、“羊群的惨叫”、“蟋蟀的歌唱”[6]，交织成一曲多感官的田园交响乐。济慈也并非停留在单纯描写景物，而是通过感官体验，达到与自然的共鸣。这种“美感主义”的倾向，即将自然之美作为对人生的终极慰藉，体现了英国浪漫主义中一种典型的通过审美体验实现精神超越的路径。正如王威(2024)所言，济慈以感官论为媒介，最终指向的是对“真”的审美把握。这种“美即真”的诗学命题，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理性：它不通过逻辑推演，而通过感官的完满体验抵达对世界本质的直观洞见[7]。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同样表现出对自然之美的深刻体察与颂扬。他细致记录湖畔的四季更迭：春日冰裂的轰鸣、夏夜动物的声响、秋日树叶的绚烂、冬日雪地的宁静。然而，梭罗的自然审美不止于感官愉悦与情感抒发，更与一种现实的生活体验和哲学思考的紧密结合。他宣称“我来到森林，是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去面对生命的基本事实”[8]。自然之美对于梭罗而言是现实的组成部分，是引导人摆脱社会虚伪、回归生活本真的指路明灯。他独居在瓦尔登湖，本身就是一种以自然为镜、反观自我的审美实践。因此，《瓦尔登湖》中的自然，既是审美的对象，更是实践的场地和真理的学校。这种将审美体验导向生活实践与哲学认知的倾向，构成了美国浪漫主义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此可见，无论是济慈诗中那令人沉醉的秋日盛景，还是梭罗笔下那引发真理思考的湖畔风光，自然都被赋予了一种超越现实而存在的精神维度。它成为诗人与作家寻求本真、实现心灵自由的家园。这是英美浪漫主义在面对相似的时代课题(工业革命、社会转型、精神危机)时，共同开辟的一条精神出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有很多描写大自然的诗歌。若以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很多诗歌都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意识”[9]法国和英国工业革命促使英国社会发生极大变革，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卷入这场洪流当中，促使他们开始向往人文、自由以及思考生态问题。而当时十九世纪的美国正处于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阶段，面对充斥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工业社会，梭罗以超前的眼光预见到了工业社会精神失落的后果，并毅然选择在瓦尔登湖畔度过为期两年的“与禽兽相伴，与飞鸟为邻”的农耕生活。《瓦尔登湖》一书便蕴藏着梭罗批判现实社会、回归自然的渴望和探索内心的呼吁[10]。由此也可以推断出济慈与梭罗在“自然作为精神共同体”这一立场上高度一致。其差异并非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而是同一精神追求在不同文体、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呈现方式。

### 3. 自然功能的不同：感情镜像与理性启示

在自然崇拜的基本立场之下，英美浪漫主义在自然的核心功能定位上产生了显著区别。英国浪漫主义更倾向于将自然视为情感的镜像与诗意的源泉，强调主体情感向自然的投射与融合，这也决定了其基调常是非理性的、直觉的、感伤的；而美国浪漫主义(尤以超验主义为标志)则更强调自然作为理性启示与道德的载体，注重通过自然观察获得哲学认知与社会审视的视角，这也决定了其基调更具理性的、思辨的、实践的色彩。

#### 3.1. 《秋颂》：情感投射、瞬间永恒与消极能力

济慈的《秋颂》是英国浪漫主义情感自然观的典范。诗歌通篇洋溢着对秋天丰饶的沉醉与礼赞，但

这种礼赞深深浸润着诗人个人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感悟。自然景物——累累的果实、嗡嗡的蜂群、收割的田野、傍晚的霞光——无一不是诗人内在情感状态的外化与象征。济慈并非在冷静地分析秋天，而是在用全部感官和情感“体验”秋天，与秋天融为一体。这种“物我同一”的境界，是通过强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情感的投入实现的。

更重要的是，济慈通过《秋颂》展现了他著名的“消极能力”美学思想。面对秋天，诗人不是以一个强加秩序的主体去剖析它，而是“消极地”敞开自我，让自然的万千印象涌入心灵，并沉浸在对其丰富性与不确定性的感受之中。“你有时也见到，在收割完的田野，/有个拾穗人，头顶稳稳地顶着麦捆，/踏着溪中的圆石走过，步子不摇不晃”[6]。这样的画面，没有剧烈的冲突，没有宏大的议论，只有瞬间的、静观的、充满和谐的美。济慈在此捕捉秋天一个典型的劳动瞬间，使其超越了具体时空，通过文字达到永恒。这种对自然中“瞬间美”的捕捉与永恒化，其动力正是诗人丰沛的情感与敏锐的直觉。自然成为了储存和激发诗人复杂情感的宝库，诗歌则成为将这些情感转化为永恒艺术形式。这也是我们常言的托物言志。因此，《秋颂》中的自然，主要功能在于激发美感、承载情感、并通过艺术创造使作者的情感与审美被永恒记录下来。

### 3.2. 《瓦尔登湖》：理性观察、道德隐喻与社会审视

梭罗的《瓦尔登湖》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尽管书中不乏对自然之美的动人描绘，但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是理性的观察、记录与思考。梭罗像一个物理学家般精确测量湖水的深度与温度，详细记录动植物的习性，分析土壤的成分。这种科学式的严谨，体现了更高的哲学目的：理解自然的规律，并从中推导出适用于人类生活的真理。

在梭罗看来，自然是一本道德的教科书与哲学启示录。蚂蚁的战争隐喻着人类的冲突，湖水的纯净象征着心灵的澄明，四季的循环启示着生命的律则。他写道：“我愿面对生活的事实，无论它是何等的严峻，……看看我是否能学会生活所要教导我的，而非等到临终之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生活过。”[8]自然在这里，是“生活事实”最本真、最集中的体现。通过感受自然、简化物质需求，人才能剥除当代社会习俗的遮蔽，从而获得关于生命、社会与自我的真知。

尤为突出的是，《瓦尔登湖》中的自然观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指向。梭罗对自然的歌颂，始终伴随着对当时美国社会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与精神空虚的尖锐抨击。他认为，人们忙于无休止的劳作与追逐财富，反而丧失了感受自然、思考生命的能力。“他们因为一顿晚餐而牺牲了自由”。瓦尔登湖的实验，不仅是梭罗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更是一次针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公开批判。因此，《瓦尔登湖》中的自然，其核心功能在于认知与批判，它既是获取智慧的源泉，也是衡量社会病态的标尺。

## 4. 聚焦主题与微观比较

前文指出，英美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差异并非“英国感性与美国理性”的二元对立，而是同一主题的变体。然而，若这种论断仅停留于宏观层面的特征概括，则难免滑向另一重本质主义陷阱——以新的二分替代旧的二分，却仍未真正进入文本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聚焦主题”，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选题收束，而是一种自觉的方法论选择：放弃对两部作品进行面面俱到的平行比对，转而将分析的能量集中于少数具有典型意义的维度上。本文选取声音与时间作为聚焦的主题，其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这两大主题在《秋颂》与《瓦尔登湖》中均占据结构性的核心位置。在济慈笔下，秋天并非一个线性的季节过渡，而是一个被无限拉长的“充盈当下”；时间在此不是流逝的载体，而是被凝固、被空间化的审美对象。梭罗则以全书十八章的四季循环为骨架，将时间编织为一种可实践、可居住的生命形式。同样地，听觉在《秋颂》的第三节汇聚为全诗最密集的意象

群——蚊蚋的哀歌、羊群的哞叫、知更鸟的呼哨——构成一幅多声部的挽歌织体；而《瓦尔登湖》中，火车的嘶鸣、教堂的钟声、冰裂的轰鸣，则无不被梭罗转化为一种穿透表象、叩问意义的精神召唤。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时间感知与听觉经验恰好处于“感性直观”与“理性反思”的交界地带。时间无法被“证明”，只能被“体验”；声音无法被“凝视”，只能被“聆听”。这意味着，任何关于时间与声音的书写，都必然同时调用感官的沉浸与理智的赋形——这正是本文试图超越“感性或理性”二元框架的最佳分析点。

有鉴于此，本节设立两重微观比较。聚焦时间，追问济慈如何通过“瞬间的永恒化”将流逝转化为美，梭罗又如何以“四季的循环”将时间实践为德性；聚焦声音，探析济慈何以将哀鸣编织进和谐的织体，梭罗又何以将听觉锻造为穿透表象的认知器官。两重比较并非平行罗列，而是从“对时间的体认”走向“对他者的聆听”，层层递进，共同呈现英美浪漫主义自然书写的深层结构。

#### 4.1. 时间微观比较之瞬间永恒与四季循环

##### 4.1.1. 《秋颂》：时间的凝滞与瞬间的永恒化

《秋颂》最显著的时间特征，是其对“过程”的省略与对“状态”的放大。诗歌开篇以一系列现在分词“mellowing”“swelling”“plumping”等营造的“进行却未完成”的状态，实则埋伏着时间的箭头：果实必须“swell”才能成熟，蜜蜂必须“think”暖日将尽。营造出一种正在进行却永不完成的丰盈状态。秋天不是从夏到冬的过渡，而是一个被无限拉长的饱满瞬间。Fogle的经典论断在此获得更深的印证——诗中秋的本质“被固定于一个静止的永恒瞬间”，而此效果正来自“近乎催眠式的单一暗示重复”。这是济慈独有的时间炼金术：以对过程的反复摹写，取消过程的目的论指向[11]。

尤为精妙的是第二节中那个拾穗人的形象：“你有时也见到，在收割完的田野，有个拾穗人，头顶稳稳地顶着麦捆，/踏着溪中的圆石走过，步子不摇不晃。”[6]这一画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她从哪里来，往何处去，皆不交代。济慈在此运用了典型的“消极能力”：他消隐诗人的主体意志，让一个日常劳动场景在文字中凝固为永恒的艺术雕像。时间在此被空间化、被结晶化。这是济慈对抗时间暴政的方式：不是否认流逝，而是在流逝中攫取那个“充满包孕性的瞬间”，使其摆脱线性时间的桎梏。

这一时间诗学的最终归处，并非纯粹的形式游戏，而是济慈所谓“消极能力”的彻底实现。消极能力的意义在于诗人“消泯自我”，与客体达成“物我交融”。在《秋颂》中，这意味着：诗人不是观看秋天的主体，而是秋天借以观看自身的媒介[12]。

诗中无“我”。这不是技巧的偶然，而是存在论的选择。济慈让渡了自己的感官，使其成为秋的感觉器官；他以自己的眼睛为秋成像，以自己的肺腑承载秋的音乐。第三节中“篱下的蟋蟀歌唱”“红胸的知更鸟吹响口哨”“归集的燕子呢喃”[6]，这些声响并非“关于”秋天，它们就是秋天本身。时间在此彻底肉身化：不是被言说，而是直接显形。

《秋颂》对抗时间的策略，并非否认流逝，而是以瞬间定格时间的流逝。它让拾穗人永远行走在那条溪中，让蜂群永远以为暖日将尽，让燕子的呢喃永远悬在黄昏的天际。济慈以二十六岁的生命，将死亡前最后一个完整的秋天铸成英语诗歌中最不朽的时钟。

##### 4.1.2. 《瓦尔登湖》：时间的循环与过程的伦理

在时间安排上，梭罗打破了时间的一维性特征，解构了传统空间的僵化与停滞，而是以四季的循环来呈现自然空间的非单向度的、可圆周式循环的永恒特质[13]。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以四季循环为框架，却从未让时间真正回到原点。这不是封闭的轮回，而是螺旋上升的过程哲学：“一个人的肉体必须与季节一同腐烂，才能生出飞翼。”腐烂不是终结，而是重生的前提——时间在此是被经历、被体验、被赋予意义的媒介，而非被凝固的对象。梭罗从不将春天视为夏天的准备，也不将冬天视为万物的终结；每一

个季节都是完整的、自足的存在形态，正如人的每一种生命状态都值得被充分经验。

梭罗时间观最具革命性的一刻，藏在1852年4月18日的日记中：“这是我第一次感知到，这一年是一个圆环——我清晰地看见了春季的弧线。”[8]记忆与期待汇聚为单一的无时间性维度，而在被充分感知的当下。梭罗不需要像济慈那样截取瞬间并将其结晶为艺术雕像，他只需调整观看的方式，使每一个普通日子都能拥有永恒。

这一认知直接通向实践伦理学。梭罗反对的不仅是物质浪费，更是时间的异化。织布工厂的女工“成为工具的工具”，康科德的邻人“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他们并非不努力，而是将生命抵押给被钟表切割的时间，将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箴言内化为无需质疑的生存规律。梭罗的回应是彻底而坦诚的：将时间从金钱的等式里赎回。经他精确测算，一年劳作六周足以维持简朴的生计，其余时间归还给真正的生存：阅读埃斯库罗斯，测量湖深，观察蚂蚁大战，凝视潜鸟游弋。他“独自一人时最不孤独”，因为独处不是隔绝，而是感知时间的永恒。

梭罗对历史的审慎态度同样源于这一时间伦理。他在《瓦尔登湖》结语中写道：“别明确地限定我们将来应该是什么模样；至于过去或者从前，那就像我们的影子，无非是表明我们还在阳光下活着而已，应该将其抛在身后。”[8]过去不被背负，未来不被抵押——这是时间伦理的彻底实践化。

济慈以“消极能力”让拾穗人永远行走溪中，将流逝铸成雕像；梭罗则以“积极耐心”让自身成为时间圆环上的一个啮合点。他认为人的思想和情感应和着四季的运转，如同两个齿轮彼此咬合……每次只接触一个啮合点，从这个点获得促动和推力，瞬间便转入新的季节。人与时间的关系，不是对抗，不是截取，而是啮合与共舞。这是梭罗与济慈最深刻的镜像对照：济慈将时间空间化，以艺术的凝固对抗流逝；梭罗则将空间时间化，以生活的过程性实践拥抱循环。

## 4.2. 听觉微观比较之哀歌与钟声

### 4.2.1. 《秋颂》：听觉交织与哀歌升华

《秋颂》第三节的听觉织体并非对自然声响的被动摹写，而是建立在以问句启动的应答结构之上。开篇“春歌何处寻？”——这一追问使全诗脱离前两节的静态描绘，暴露出抒情主体对时间流逝的清醒觉知。济慈将发言权让渡给秋天的多重声部——群蚋、羔羊、蟋蟀、知更鸟、燕子——使缺席成为在场的组织原则。

值得深究的是这批声音的挽歌性质。“哀歌”(wailful)、“嗥叫”(bleat)、“呼哨”(whistle)均非欢愉之声，斯珀津早年在济慈意象统计中已指出，“哀鸣”类词汇在济慈晚期诗作中高频出现，且多与秋天、黄昏、暮年等时间意象共现[14]。但济慈从未让哀鸣沦为单纯的悲泣，而是被整合进更阔大的听觉秩序，成为声部之一。这一整合行为的诗学本质，并非以审美取消死亡，而是让死亡获得发声的位置。贾继中将此进程概括为济慈“灵视想象”的终局：不再追寻虚幻的超越，而是“拥抱死亡，讴歌生命中短暂即逝的美感”。

1819年9月19日，济慈在温切斯特郊外写就此诗，距确诊咯血不足两年。这一生命史背景并非文本的决定性因素，却使第三节的挽歌织体获得自传维度的共振。然而，济慈的处理始终是非个人化的：他没有将自己的死亡写入诗行，而是让蚊蚋、羔羊、知更鸟替他完成送别，这便是消极能力的最终形态。

### 4.2.2. 《瓦尔登湖》：听觉的穿透与钟声的召唤

梭罗的听觉世界在于听觉如何成为一种认知范式。近年卡托波迪斯以“振动认识论”重释《瓦尔登湖》的听觉实践：梭罗的倾听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捕获，而是声波穿透身体边界后建立的共振关系。在这一视角下，火车、钟声、鸟鸣不再是某种固定象征的载体，而是频率各异的声音。它们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听者所处的位置、以何种方式去倾听[15]。

这一视角揭示了火车意象的复杂性。批评惯于强调梭罗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却忽略了他对机车声响的听觉转化。梭罗将蒸汽机的嘶鸣听作“鹰的尖叫”，将车轮节奏拟为“partridge, partridge”——这是将工业噪声纳入自然听觉秩序的象征行动，而非简单的拒绝。

最精微的听觉时刻或许是瓦尔登湖的冰裂。1852年2月3日，梭罗在月光下走过费尔黑文悬崖，记下冰层崩裂的声响：“如炮火，如狗吠”。此处测量员与诗人并非“退场”与“登场”的交替，而是同一种听觉行为的双重面向：精确记录声响的声学特征，与以隐喻将其纳入人类听觉谱系，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界面。梭罗拒绝阿加西兹的灾变论，选择莱尔式的均变说，并非科学立场的孤立选择——它同时是一种听觉伦理：倾听地球缓慢的自我言说，而非等待那一声终末的巨响。

梭罗的听觉实践因而拒绝被分割为“批判的耳朵”与“审美的耳朵”。他将汽笛听成鹰啸，是将工业噪声置于进化的长程中重新聆听；他将冰裂声写作“whoop”，意味着把地球的物理运动纳入身体感知的尺度，使之成为一种可亲身遭遇的经验。这一聆听方式既不同于济慈式的审美凝定——将声音封存于静观之中，也有别于浪漫派对自然本真之声的神话化想象。它指向一种更谦逊、也更深刻的伦理姿态：让世界按其自身的频率发声，而人只需校准自己的位置。

## 5. 文化传统与时代语境

英美浪漫主义自然观呈现出的上述异同，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具体的历史语境。

英国浪漫主义诞生于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社会矛盾加剧、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时期。圈地运动彻底改变了英国农村和城市人口结构，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诗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迅速瓦解、自然环境遭受破坏、个体产生强烈疏离感的时代。因此，他们的自然书写，常常带有一种对前工业时代田园生活的怀旧，以及通过自然之美寻求精神慰藉与个体解放的迫切愿望。同时，英国深厚的经验主义哲学与感伤主义文学传统，也为强调感官体验、情感表达与主观想象的自然观提供了土壤。济慈等诗人将自然高度审美化与情感化，正是这种时代焦虑与哲学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浪漫主义，尤其是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则生长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梭罗写作《瓦尔登湖》时，美国正处于从农业为主向工业资本转型的关键时期。但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拥有广袤的未开发自然边疆，西进运动如火如荼，这为“自然作为精神新大陆”的观念提供了地理基础。同时，美国社会缺乏欧洲那样沉重的封建历史包袱，清教传统中重视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勤勉实践的精神，与欧洲浪漫主义思想结合，催生了更具行动力与内省色彩的超验主义。爱默生提出“自然为精神之象征”，号召人们直接从自然中阅读上帝(或“超灵”)的法则。梭罗则进一步将这一哲学付诸实践。此外，19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商业化、物质化趋势的加剧，使得梭罗等知识分子感到更强烈的精神危机，其自然书写中的社会批判维度也因此比英国同辈更为直接和激烈。可以说，美国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是欧洲思想在新大陆的移植、适应与激进化产物，它更少怀旧，更多面向未来；更少纯粹的审美逃避，更多积极的实践介入。

## 6. 自然书写的遗产与回响

以济慈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将自然情感化、审美化的传统影响深远。其借自然寻求精神抒发的模式，在维多利亚诗歌乃至现代文艺中持续回响。例如，菲利普·拉金对乡村景色的复杂凝视，便是此传统在现代下的变奏。电影、摄影及自然文学中对风景的抒情化处理，也继承了此传统。在技术理性时代，保持对自然的感性与审美是维系人性完整的关键。

梭罗及《瓦尔登湖》所代表的理性与实践传统，直接启发了现代生态主义运动与环境批评。其生活实验、简朴主张与社会审视，为后世环保运动奠定了思想与行动基石。雷切尔·卡森等人的著作，延续了其结合科学观察与道德关怀的路径。美国“自然写作”的兴盛，也从安妮·迪拉德至巴里·洛佩兹，继

承了梭罗式的观察、体验与哲思融合的传统。该传统强调，对自然的爱与理性认知、社会责任及批判实践必须结合。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重审这两种传统意义重大。纯粹浪漫化的审美易流于感伤与逃避，而过度理性的观则可能陷入工具化。当代生态思想正呼吁情感与理性的再融合。我们既需济慈式的感性联结，视自然为有灵的生命体；也需梭罗式的理性勇气与实践精神，以剖析危机根源、探索可持续道路并推动社会改进。

## 7. 结论

本文以《瓦尔登湖》与《秋颂》为比较点，探讨了自然在英美浪漫主义文学中功能的异同及其深层根源。研究发现，两者共同将自然作为对抗现代性异化的精神支柱与价值源泉，体现了浪漫主义思潮的核心诉求。

其差异造就了两种魅力独具的自然书写范式。以济慈《秋颂》为代表的英国范式，是一种情感审美型的自然观。它通过极致的感官意象、拟人化手法与对“瞬间永恒”的捕捉，将自然构建为一个可供情感投射的审美乌托邦。其哲学底蕴是“美即真”的审美一元论，追求在主客交融的体验中实现个体的精神救赎。而以梭罗《瓦尔登湖》为代表的美国范式，则是一种理性实践型的自然观。它以散文的开放性，融合细致观察、生活实验与社会反思，将自然视为启示真理、验证哲学、批判社会的理性场地。其哲学根基是超验主义的理性主义，主张通过观察与思辨穿透自然表象，领悟普遍法则，并指导个人与社会变革。

这种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基因：英国深厚的经验主义、感伤主义传统与工业革命引发的怀旧焦虑；美国广阔的边疆与超验主义的哲学创新，共同塑造了各自独特的自然之思。美国浪漫主义并非简单模仿英国，而是在继承其自然之美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化、实践化改造，从而实现了创造性的发展与超越。

回到当代，这两种自然观并非彼此排斥，而是构成了一个互补的精神体系。《秋颂》呼唤我们恢复感知自然之美的能力，重建那份原始的、情感性的纽带；《瓦尔登湖》则激励我们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承担起生态守护者的责任。面对严峻的生态挑战，我们需要的或许正是这两种态度的结合——既怀有对自然共情的心灵，也具备洞察生态关联、践行简约生活的理性头脑。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留下的这份双重遗产，超越了文学史的范畴，成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 参考文献

- [1] 杜维平. 以诗论诗——英国经典浪漫主义诗歌解读[J]. 外国文学, 2003(4): 42-48.
- [2] 向玉乔. 美国的超验主义伦理思想[J]. 道德与文明, 2006(5): 41-45.
- [3] Eccles, L. (2017) *Keats, Emerson, and the Poetics of Transcenden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Chandler, J. (2016) *An Archaeology of Sympathy: The Sentimental Mode in Literature and Cinem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姜原, 郭峰. 跨越大西洋的思想传递: 从浪漫主义到超验主义[J]. 文学教育(下), 2018(1): 9-11.
- [6] 约翰·济慈. 济慈诗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7] 王威. 感官与诗: 济慈的感官论诗学观念[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4): 136-145, 151.
- [8] 大卫·梭罗. 瓦尔登湖[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 [9] 王颖, 刘伟. 浅谈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背景[J]. 名作欣赏, 2025(32): 80-82.
- [10] 倪铭英. 《瓦尔登湖》的生态伦理意蕴[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18(3): 29-35.

- [11] Turley, R.M. (2015) *Keats's Boyish Imagination*. Routledge, 22-23.
- [12] 史悦. 浅析济慈的消极能力说[J]. 文学教育(下), 2016(12): 62-63.
- [13] 龙娟, 张曦. “认同”与“偏离”——苇岸对梭罗《瓦尔登湖》的接受研究[J]. 中国文学研究, 2021(1): 148-191.
- [14] Spurgeon, C.F. (1928) *Keats's Shakespeare: A Descriptive Study Based on New Mater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p.
- [15] Katopodis, C. (2021) *Sound Ecologies: Music and Vibration in 19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Ph.D. Thesis,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